

十三次搬家感触国家 70 年脉动

文 王平华(长宁区居民、宝山区政协七届委员)

1953年9月22日，我出生在上海的广慈医院（今瑞金医院），从我记事起就知道，长寿路的358号,360号是我家,362号,364号是叔叔家，我们住在360号二楼的前楼和后楼。358号是房客住的，楼上的晒台是公用的。358号至364号的楼下是“大自鸣钟”的新大昌布店。

父亲告诉我，这房子是解放前夕祖父用30根金条顶（买）下来的，事后发现是买了一个“陷阱”。原来大房东早已把房子租给了二房东。二房东是以五年前的房租合约价格，付给大房东金圆券，而二房东向房客收取五年前房租价格的黄金。二房东是“大自鸣钟”地区的白相人（流氓）。大房东惹不起，便转嫁危机，把房子卖给了祖父，祖父接过了“陷阱”。到上海解放，我家居然没有进去住过一天。解放后，父亲打赢了官司，这才算住进了自己的房子

好景不长，1957年反右斗争，父亲多嘴多舌被送去劳改。母亲带着我们姐弟俩和外婆生活。后来居委会相中了我的房子，开办弄生产组。1959年底，我家被迫搬出了自己的祖屋，住到了宝山县罗店镇金家宅的外婆家。那年我才6岁。外婆家的房子早被生产队当作食堂了。宅上有一个后生当兵后房子空关，生产队把我们祖孙四人安排到这家空关房子落脚。后来“大食堂”解散，我们住回到了外婆的祖居老屋。1964年，父亲劳改期满，上海市区的房子已经被房管局征收，父亲无家可归，也跟着投靠岳母家。可是，外婆家的生产队不敢收留一个刑满释放的劳改犯。无奈，母亲只能带着我们回到距离罗店镇十路路的祖籍地王家楼。那时我12岁，读四年级。

到了王家楼才发现，祖上的房子有一半在土改时白相人流氓了。我家是中上成份，



长寿路胶州路路口的“大自鸣钟”地区，图中沿街铺面伪作者故居

所以还保留着三间半平房，其中有二间被生产队占用作为仓库。我们回老家，生产队也不欢迎。母亲求爷爷告奶奶，好说歹说，生产队才勉强让我们入住，但一间房还是要让生产队当化肥仓库。此刻，我家已经搬了三次家了。

1966年“文革”爆发，14岁的我结束了读书生涯，参加了生产队劳动。经过三年的劳作，家里有了点积蓄，开始筹划翻建几间半破败的老屋。买不起砖头，我到市区的工厂去弄煤渣、电石污，自己做砖头。缺瓦片，用平时省下来的柴草到窑厂去换瓦片；缺桁条，用短钢筋焊接，再用水泥石子浇筑混凝土桁条。1972年，我完成了三间半平房的拆落地翻建工程。第四次搬家的我已是一个19岁的大小伙子了，心里充满着成就感。

新房子没住上一年，“农业学大寨”运动规划成片农田，我的新房也在“规划”之列，只能迁建到指定的农民新村。要是四类分子家属，我家只能翻建一幢半楼房，第五次搬家时，我全然没有了上次的那种成就感，心情十分沮丧。

流淌在血脉里的红色基因

——写给我已故父亲的一番话

文 杜晓建(长宁区残联原副理事长)

1941年夏,您18岁。老家,山东省广饶县抗日根据地最艰难之时——日寇的连续扫荡,加受灾荒,您在极度饥饿中选择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多少年以后,您对儿孙们常唠叨:“跟着共产党,穷人才能过上好日子”。毕竟,您自幼被缠足的小脚母亲我的奶奶牵着,一根打狗棍,一个讨饭碗,尝够了流浪乞讨的苦。

1945年初,您按照根据地党组织的部署,在家乡动员青壮男儿参加八路军时,最先动员自己的哥哥奔赴战场。那年,没有照片存世的伯父,您的胞兄26岁。从此弟兄分别,文武天各一方(伯父名乐武,家父名乐文)。家族衍续至今五代人,经常会有儿孙们嘀咕,祖上早就安排好这对亲兄弟要文武归宗的。

1949年3月,您告别家乡父老,带着一行根据地的干部,随军南下数月。5月初抵达丹阳,聆听华野首长后来的上海市军管会主任陈毅对接管上海的讲话后,受命赴上海宝山大地战区履新军管重任。此时,没有通讯胞兄的刘行国际电台激战五天后,您在广饶老乡战友的帮助下,站在一大片新家土堆中,找到了白布裹身刚入土的哥哥。为了保全上海这座大都市,上海战役的外围阻击战场选在宝山,第一场恶战在刘行,整个上海战役,人民解放军牺牲7785名官兵,而首战倒在刘行国际



后排中间伪作者,三排作者父母

电台阵地的就有4000多名年轻生命,占了上海解放战役牺牲人数一半多!眼看着哥哥俩在解放上海的前沿阵地要见面了,残酷的战争却让您和胞兄阴阳两界,生死相逢。每每说到这里,您老还会泪流满面。

彼时的您,擦干眼泪,投身当地军事管制任务中。却不忘寻觅插针地寻找胞兄所在部队的信息。只要见到山东老乡,找到根据地一起出来的战友,您都会激动一阵。很快获悉,您胞兄生前部队已奉命转战福建。得知的碎片信息:胞兄隶属28军,共产党员,机枪手。

您不甘心,坚持不懈地寻找胞兄生前部队,向有关部门写信请求查询,均未如愿!直到1999年5月,上海解放50周年之际,上海市民政局领导给您写信并附寄《热血丰碑

了500多平米的厂房。新楼落成后,我从原来的猪棚工车间搬到了明亮宽敞的新厂房。第七次搬家的那一晚,我翻来覆去睡不着,五味杂陈。

此后不久,我从生产型企业转向贸易型企业。在宝山县领导的支持下,我组织了7家个体户,建造了宝山县的第一个个体经营商场“大华商场”。每家两间门面,楼下经营,楼上住宿,这就迎来我的第八次搬家。

上世纪90年代初,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,掀起新一轮改革热潮,特别是修改了宪法章程。新宪法明确指出,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,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,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。我又鼓起发展事业的劲头。1996年在罗南的远景村购买了8.5亩土地,投资了近千万元人民币,建造了华方大酒店,并且也把家搬到了酒店,这是我的第九次搬家。之后,我把华方大酒店转让,投资其他行业。1999年在万荣路永和路口购买了一套6楼复7楼的复式房子,搬了第十次家。住了四年,因没有电梯,2004年又置换到了中山公园附近的路易·凯旋宫,成为长宁区的居民。此为第十次搬家。

我转行后开办了上海龙云体育用品有限公司。2009年又在莘砖公路的临松江科技城购买了近600平方的办公用房,把公司的业务全部转入了该科技城。此为第十二次搬家。企业步入良性发展轨道后,手头的经济宽裕了。2012年我在上海近郊的吴江汾湖购买了一套400多平方米的别墅,作为休息度假房。别墅三面临水,直通淀山湖。在别墅边的河面上放上几块地笼网,周末来度假时起一次网,那鱼、虾、蟹、螺是我一周的荤菜了。

回想自己一生中的十三次搬家,那一幕幕场景缀连起来不就是一部中国平民家庭史嘛。那一幕幕场景让我感触到国家70年的脉动,苦难、忧伤、昂扬、激奋、喜悦、感慨、感恩,一股脑儿涌上心头。

文 尤建新(天山茶城党支部委员)

消费者走进天山茶城的第一印象是古色古香的建筑和庞大的规模。徜徉在鳞次栉比的茶铺里,更是被浓浓的茶文化气息所吸引。17年来,天山茶城已成为长宁的地标之一,成为上海市民了解茶文化的购物天堂。可又有谁知晓天山茶城的“前世”呢?

天山茶城的前身是上海色织十四厂,前身的前身是上世纪30年代一个名为大丰恒的老织布厂。听老职工们讲,解放前的“大恒丰”厂子周边全是农田和河浜,也就是说,中山西路穿越在田野里。下雨时河浜涨水漫进车间,工人们就站在水中劳作。寒冬腊月,凛冽的寒风从门窗缝里吹进来,工人冻得瑟瑟发抖。三伏暑天,加上机器产生的热量,工人如同蒸桑拿。厂里没食堂,工人自己带来咸菜就白饭,弄不好还会饿掉。老工人们说的形象:“鸡叫出门,鬼叫进家”。一天工作十三个小时。是共产党把那一代老职工救出苦海。新中国成立以后,企业成为全民所有制的上海色织十四厂,工人当家作主,成为企业的主人。工人为国家创造财富,也为自己改善了生活。用老职工们的话说“旧社会我,促是棵草,新社会我促成了宝!”

改革开放的春风为上海色织十四厂插上腾飞的翅膀。上世纪80年代,企业从德国、意大利、比利时引进了世界最先进的斯帝特、毕嘉诺全自动织布机,职工也从300多

一方牌匾三代兵

文 陈日旭(长宁居民)



今年开春时分,居委干部给我送来一方金灿灿的不锈钢牌匾。牌匾横向长方形,大小正适合挂在门楣之上。喜庆的双线条边框中间,大红色的魏碑体“光荣之家”端庄夺目,右下侧是“上海市人民政府退役军人事务部监制”字样,另一侧则镌刻巍巍长城隐隐图案,制作精良,寓意深长。

不久,小女儿来电告知,她家大门上方及客厅墙上各安上了一块“光荣之家”牌匾。我明白,此因女婿和外公都是退役军人,叠加的荣光。同样一方牌匾,有着三代人当兵的故事——

老汉我1961年参军,1965年退伍。女婿1991年当兵,外孙2015年入伍。三代人当兵军种相同,都是陆军。兵种却不同,我是步兵,女婿炮兵,外孙通信兵。我是入伍时,一列火车从老西站(现轨交中山公园站)出发,带兵首长在车厢里宣布,目的地是江西上饶(火车不开动,地点是保密的),部队具体驻地是上饶之西的罗桥。

整队步入军营大门,老兵们敲锣打鼓欢迎。嘴,明显朝上走的山坡上,红砖营房一侧墙上“团结、紧张、严肃、活泼”八个大字,分外醒目。人生第一次离开家乡,告别亲人,眼前的一切都是新鲜的!半个月的新兵连集训后,我被分入步兵连队。步兵要掌握三大技术:射击、投弹、战术。真正的考验是体能训

人和优质的服务,吸引了众多在沪外籍人员光顾。“龙好茶具”去年销售额达到了5800多万元。

来自福建的林立刚曾是一名大学生党员,就读于厦门大学国际商贸专业本科,毕业后在福建省外贸公司担任科长职务。太太2004年通过人才引进,从福建省立医院来到上海和平眼科医院工作。为了家庭团聚,小林辞职下海,在天山茶城里当起小老板,专营武夷岩茶。小林适应能力极强,很快融入了上海生活。现在是上海福建闽侯商会的副秘书长,天山茶城党支部的骨干党员,又是茶友足球队的队长,还组织起研究文学历史的茶艺家。

他听从党支部安排去属地玉屏居民区开茶会的同时,茶城管理方和小商户坚持诚信经营、服务社会的理念,先后被上海市政府评为上海市文明单位,被上海市社会工作党委评选为上海党建基地。在这座容纳400余家商铺的茶城里,来自天南海北的茶商,个个都有一部财富人生的“小说”。他们来到上海,来到天山茶城,成为海纳百川里的一朵“浪花”。

公司二楼有个“龙好茶具”商铺,业主是从福建安溪大山里走出来的残疾青年,小夫妻带着六万元启动资金,怀揣着对生活美好的梦想,来到天山茶城,经过十多年的努力拼搏,已在上海开出5家分店,属下员工60多人。并在普陀长征工业园租下1200平方米的一个楼面作为龙好茶具的总部和电商平台。最近,又在江苏宜兴开出物流配送中心。经营的茶具品种达4000多种。商品的齐全,相对低廉的价格

我,曾经是上海色织十四厂的后勤科长、分厂厂长,后来受聘担任茶城管理方的管理员和茶城党支部委员,主持支部日常工作。经历了这70年变迁半个世纪,成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、参与者和受益者,感到无比的自豪和幸福!

记得我大哥支内去重庆工作后,每年探亲回沪,隔壁邻居小伍知道我大哥探亲一次不容易,要帮同事四处代购衣物,他总是慷慨地将自己装配自行车的风潮,淮海路旧货商店、虬江路旧货市场、南京东路中央商场成了上海人淘旧货的好去处。我也挤在人群中,今天淘个车架,明天淘一只龙头,后天淘两只钢圈。花了半年时间,七拼八凑装了辆杂牌自行车,但杂牌比35元的“老坦克”好多了。

不久,上海兴起买处理零件自己装配自行车的风潮,淮海路旧货商店、虬江路旧货市场、南京东路中央商场成了上海人淘旧货的好去处。我也挤在人群中,今天淘个车架,明天淘一只龙头,后天淘两只钢圈。花了半年时间,七拼八凑装了辆杂牌自行车,但杂牌比35元的“老坦克”好多了。

女婿当兵在云南弥渡。他的体验是,当兵出远门,首先是生活环境与习惯的改变。弥渡位于云西南部,距上海近3000公里,多为山地,海拔较高。炮兵虽机动化程度高于步兵,但同样要强化体能训练。否则,挖火炮掩体,构筑阵地、搬运炮弹、擦拭炮管,体力会跟不上。他告诉我,服役三年其间,也曾为维护西藏稳定作过贡献。

外孙入伍在有“鹭岛”美称的福建厦门某部通讯营,驻地对面就是鼓浪屿。新兵训练大致相同,体能训练也少不了负重越野行军。他的一项任务是,常要去鼓浪屿送文件,凭士兵证和军装,就可免费上轮渡。后来,首长次数一多,轮渡站工作人员都认识他了。送文件,并不轻松,限定时刻不算,再恶劣的天气也要完成任务。故此,他不敢在岛上逗留,更无心欣赏鼓浪屿的旖旎风光。

2016年9月中旬,外孙从微信转发来照片(平时战士手机上交,统一保管,休息天可用),内容是厦门地区受超强台风“莫兰蒂”重创,有人员伤亡,市容严重破坏,当地驻军上街抢险,清除倒伏的树木。累了,官兵连队就地休息。他们就成排地躺在人行道上,成片迷彩服的身影里,我外孙也在其中。我凝望外孙的面孔,青涩中已泛出几分成熟。

军中流行一句话,步兵苦,炮兵兵,稀稀拉拉通信兵。我们祖孙三代兵种不同,并不轻松,不尽其然。我家三代退役军人的共识是:当兵扛枪,就是要吃大苦,耐大劳,才能对得起“解放军”这个光荣称呼。

自行车咏叹调

文 余国放(长宁区合作联社原党总支副书记)

上世纪六、七十年代,如果拥有一辆自行车,而且是一辆“永久”或“凤凰”的28英寸锰钢全链罩自行车,比当今拥有一辆私家车还“扎台型”。

那时,我在中山公园附近一家修配店当学徒工,月薪17.84元。我家住在天山三村,距离修配店1公里多。中午吃饭休息半小时,为了省钱,我回家吃中饭,但必须连奔带跑,否则来不及。我做梦都想拥有一辆可以代步的自行车。可要买辆自行车谈何容易,首先必须要有非常紧俏的自行车票,另外还得凑够140元甚至180元钱款。26英寸轻便车140多元,28英寸加重车160多元,锰钢的28英寸全链罩车180元。我不吃不喝,10个月的学徒工资才够买一辆自行车。

怎么办?穷有穷办法,我和同期进单位工作的小徐经过郑重商议后,决定合买一辆旧自行车。结果跑了好几家旧货商店,化了35元买了辆除了铃不响,其他零部件都响的破自行车。上下班时,一人骑车,另一人坐在书包架上,摇摇晃晃的,很不安全。

林立刚把父母接到上海与他共同生活。他说:“这是福州人的传统,更是我做儿子的责任。”2017年他的家庭被长宁区妇联评为“最美家庭”。

诸如这类的财富故事在天山茶城这块风水宝地不胜枚举。天山茶城的前世今生折射出人民共和国和上海这座大都市70年发展的轨迹。

不久,上海兴起买处理零件自己装配自行车的风潮,淮海路旧货商店、虬江路旧货市场、南京东路中央商场成了上海人淘旧货的好去处。我也挤在人群中,今天淘个车架,明天淘一只龙头,后天淘两只钢圈。花了半年时间,七拼八凑装了辆杂牌自行车,但杂牌比35元的“老坦克”好多了。

记得我大哥支内去重庆工作后,每年探亲回沪,隔壁邻居小伍知道我大哥探亲一次不容易,要帮同事四处代购衣物,他总是慷慨地将



他的爱车(28英寸永久自行车)借给我大哥使用,自己徒步上下班。我还记得我学自行车也是在这辆车上学会的。我当时一心想不通,号称自行车王国的子民怎么连辆自行车都买不到,买不起。说起自行车票,那年代特别抢手。一个几百人的单位,一年大概只能分到二、三张票,无论干部或职工都根据申请前后顺序排队,也有单位干脆采取抽签的办法。我单位的上级部门有个工会副主席,负责票证管理。人们发现他总是骑新的自行车,原来他利用职权,每隔二、三年换辆新车,旧车再原价卖出。看起来挺精明,其实是贪小失大,影响了他的前途。他写入党申请书二十多年,直到退休都没有被批准加入。当然,在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里绝大多数干部是廉洁奉公的。

由物资匮乏到物资丰盈,中国仅用了20年,到上世纪90年代末,国内市场应有尽有。到改革开放40周年的2018年,中国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,成为世界制造业大国。中国商品流通在世界各个角落。上世纪60年代的“三转一响一咔嚓”(自行车、手表、缝

纫机、收音机和照相机)已被80年代后的彩电、音响、冰箱、洗衣机、电饭煲等家电取代。进入新世纪,中国开启家庭轿车时代,拥有一辆私家车,比当年买一辆自行车还方便。据统计资料显示:2018年我国人均国民收入达9732美元,高于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。改善住房、出国留学、海外旅游、美容健身,成了人们追求的新时尚。

去年,我和老伴去加拿大旅游,住在当年与我合买35元破自行车的同事小徐(今天的老徐)家,他已在加拿大定居十几年了。说起合买破自行车往事,他感叹地说道:祖国这些年的发展真是神速啊!身在海外的中国人也感到腰板硬了。

大河有水小河流满。我的小家也折射出国家的发展。十几年前我就买了一辆轿车,女儿成家后也有私家车。我和女儿各有一套宽敞舒适的住房。有了“铁包肉”(自行车牌号),我忘不了“肉包铁”(自行车牌号)。近距离出行,我喜欢用手机扫码开锁,骑上共享单车穿行在大街小巷。不仅是怀旧,更是为了健身和绿色低碳。

又见“海伦”

文 连俊(天山居民)

松江有个残疾人上海阳光康复中心,康复中心有个“天行雕塑园”,雕塑园展出了十九位中外杰出我障人士的雕像。到那里去瞻仰,会令人近距离地感受这些身残志坚的伟人所焕发的能量和光辉。最近,我又去了一趟。站在海伦像面前,我修改了一个名人的诗:轻轻的我来了,正如我去年悄悄地走了一样,拍拍脑袋,我觉得带走不少。

下乡时,我不幸落崖受伤,造成截瘫。骤然间,连接自身与外界的桥梁断了。心无所依,情无所靠,神又怎能守舍?正当我怨天尤人的时候,昔日的老师来到我的病床前跟我说:天行健,君子以自强不息。人遭遇不幸后不可怨天尤人,而应该在生活中选择出自我实现的行为。我说,老师啊,不要给我说大道理。自强不息有什么可以比得上自己不负责任更可悲了。可也就认了,讨厌的是长期卧床,并发了疟疾:痔疮、肺炎、大便。最痛苦的是羞于启齿的大小便不能控制,有的时候觉得,自己活着的尊

严也没有了。由于中枢神经受伤,身不由己,受伤位置越高越厉害,到后来简直到了任人摆布的地步。老师“救人心切”,仍诲人不倦地说:蛙因身体上嵌入了一颗沙,伤口的刺激使它不断分泌物质来疗伤,到了伤口复合时,伤口处就出现了一颗晶莹的珍珠,那颗珍珠不是由痛苦孕育而成的吗?所以说,任何不幸、失败与损失,都有可能成为我们的有利因素。说完他拿出一本书《假如给我三天光明》。在此以前,我听说过海伦·凯勒,但对她的生平并不十分了解。看了她的书后我被震撼了,一个幽闭在盲、聋、哑世界里的入竟创作了十四部著作。我的情况比她好多了,连一本小册子也写不出,这与入的差距不就那么远吗?

伤残以后,我常常想:人生在世,总要想个办法支撑自己,使自己觉得有必要活下去,不然就是对自己不负责任,世界上没有什么可以比自己对自己不负责任更可悲了。可也就认了,讨厌的是长期卧床,并发了疟疾:痔疮、肺炎、大便。最痛苦的是羞于启齿的大小便不能控制,有的时候觉得,自己活着的尊